

◀ (上接6版)

完全不需要依靠官俸也能过非常体面的生活,那么本来也可以不必考虑出山的。

三

不在“吏”的差事里失去自由固然是很舒服的事情,但经济上损失很大也是一个老大的问题,于是陶渊明继续寻找一种比较自由而又颇有收入的新职务;后来他终于找到了,这就是到新兴的地方实力派桓玄手下效力。

桓玄出身高门,有根基,有能力,有野心,同他的父亲桓温一样,颇有志于取司马氏之皇位而代之。

谢安去世以后东晋的中枢日趋腐败,政局反复震荡。隆安元年(397)京口镇将王

二州刺史,形成最大的地方实力派。

于是陶渊明就到他手下效力。此事大约开始于隆安二年(398)诏以桓玄为江州刺史、诸藩屯于浔阳(这里正是陶渊明的故乡)推桓玄为盟主之日,至迟亦应在隆安四年(400)初诏以桓玄领荆、江二州刺史并督八州八郡诸军事之时。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曾经是桓玄之父桓温的僚佐,也是他的好朋友(参见拙作《陶渊明杂述·孟嘉其人》,《苏州教育学院学报》2017年第4期),陶渊明本人乃著名的江州高门才俊,他愿意到桓玄手下去任职是顺理成章、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。

陶渊明此时的作品《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,阻风于规林》二首和《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》等诗,表明庚子、辛丑即隆安四、五年(400、401)时,他正在荆、

通鉴》卷一二二云:“桓玄厉兵训卒,常伺朝廷之隙,闻孙恩逼京师,建牙聚众,上书请讨之。”朝廷不允许桓玄东下,无非是看出了他的别有用心。而此时陶渊明恰恰奔走于江陵与首都之间,显然身负重任,决非等闲之“吏”。

隆安五年(401)冬天,陶渊明遭遇母丧,依礼制退出官场。就在他居丧期间,政局进一步发生巨变。元兴元年(402),尚书令司马元显称诏发兵讨伐桓玄,桓玄迅即攻入建康,杀司马道子、元显父子,自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丞相、录尚书事、扬州牧,领徐、荆、江三州刺史,兼统西府、北府军,一举取得了军政全权;元兴二年(403)冬,桓玄“接受”禅让,称帝,国号楚,改元永始。晋安帝司马德宗则被安置到浔阳,软禁起来。

先前以晋安帝为旗帜的东晋王朝腐败已极,完全失去人

等,“受命出征则置参军”。

只要不是一般行政机构里的“吏职”,陶渊明都还能接受,但在刘敬宣手下时,他关于归隐的决心就完全下定了。《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》诗云:

我不践斯境,岁月好已积。
晨夕看山川,事事悉如昔。

微雨洗高林,清飙矫云翻。
眷彼品物存,义风都未隔。

伊余何为者,勉励从兹役?
一形似有制,素襟不可易。

园田日梦想,安得久离析?
终怀在归舟,谅哉宜霜柏。

可知到乙巳即义熙元年(405)三月,陶渊明对自己的“一形似有制”、失去充分自由深感不满,对如此卖劲地在外面奔走效劳狠狠地自嘲。(“伊余何为者,勉励从兹役?”)

“园田日梦想,安得久离析?终怀在归舟,谅哉宜霜柏。”这四句诗表明陶渊明已

寝迹衡门下,邈与世相绝。顾眄莫谁知,荆扉昼常闭。

凄凄岁暮风,翳翳经日雪。倾耳无希声,在目皓已结(一作洁)。

劲气侵襟袖,萑苇谢屡设。萧索空宇中,了无一可悦。

历览千载书,时时见遗烈。高操非所攀,谬得固穷节。

平津苟不由,栖迟诟为拙?寄意一言外,兹契谁能别?

诗的前一半痛陈自己在衡门之下饥寒交迫的苦况,不当官,经济方面问题很大啊。“倾耳无希声,在目皓已结”,这样好的雪景,自己也无心欣赏,只觉得“了无一可悦”,自己已经穷得顾不上审美了。

子曰“君子固穷,小人穷斯滥矣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,而陶渊明在这首诗中承认自己是“谬得固穷节”;本来并不想如此,而是实逼处此,没有办法。“平津苟不由,栖迟诟为拙?”二句说,出仕乃是光明大道(汉儒公孙弘任宰相,封平津侯),退隐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,但他又自我安慰说,既然前一条路走不通,那么退回故园也还不能算是“拙”。

陶渊明这时本心深处并不打算“拙”,并不想固守其穷,只不过没有更好的出路。这同他几年后主动归隐、“守拙归园田”(《归园田居》其一),心情是完全两样的。到归隐后,“拙”已经成为他引以为自豪的品格,而非现在似的无可奈何了。

居丧期间的陶渊明又写过几首四言诗(《停云》《时运》《荣木》),流露了急于出山的迫切心情,又忽然为外祖父孟嘉写传,大讲其人与桓温的亲密关系。凡此种种皆大有向桓玄致敬的微意;对于被桓玄赶到浔阳来的晋安帝,他未有任何表示。

关于陶渊明两度为参军的经历,史书中只是一笔带过。从过去他为官的经历看去,他的目的应当仍在经济收入,因为丧母须花大笔的钱,又闲居数载,经济上必有问题。至于最后一次充当彭泽令,经济因素尤其明显,他在《归去来兮辞》的小序中不仅明确地说到这一次复出可望有一笔不菲的“公田之利”,也就是充当县令的官俸(参见拙作《陶渊明与“五斗米”》,《文史知识》2017年第12期),而且说起过去历次出仕都是“口腹自役”——为了吃饭而奔忙。

陶渊明当官相当于后人为解决生计而谋职。

但是除了要吃饭,他还需要自由,精神生活的意义决不下于物质生活。县令本来也还是可以当的,这同在州里担任“吏职”要时时看上司的脸色、听领导的吩咐不同;可是一个

(下转8版) ▶



稚子候归图



抚孤松而盘桓图

(均为以陶渊明为描绘对象的书画资料图片)

恭联络荆州刺史殷仲堪、南郡公桓玄等人起兵讨伐掌握实权的佞臣王国宝;以太傅身份摄政的宗室成员司马道子一方面杀王国宝以谢天下,同时密谋消灭京口、江陵两藩的势力。中央和地方的斗争进入白热化的新阶段。隆安二年(398)王恭、庾楷、殷仲堪、桓玄等再次起兵,差一点打进首都,但因王恭部将领刘牢之、刘敬宣父子倒戈而失败,王恭被杀。“仲堪既知王恭败死,狼狽西走,与桓玄屯于浔阳,朝廷严兵相拒”(《晋书·会稽王道子传》);“恭既死,庾楷战败,奔于玄军,既而诏以玄为江州,仲堪等皆被换易,乃各回舟西还,屯于浔阳,共相结约,推玄为盟主,玄始得志”(《晋书·桓玄传》)。桓玄大显身手的机会到了。隆安三年(399)他利用荆州大水、粮食缺乏的有利时机,发兵打败前盟友殷仲堪以及佗伧期等藩镇势力,兼领荆、江

江二州刺史桓玄手下任职,乘船在长江中、下游之间奔波。

陶渊明喜欢这样一个人行动,不过他也深感奔波的辛苦,时时想到隐居于田园的安闲快乐。其时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:“久游恋所生,如何淹在兹。静念园林好,人间良开辞”;“高歌非吾事,依依在耦耕。投冠旋旧墟,不为好爵萦。养真衡门下,庶以善自名”。尽管如此,陶渊明并没有像先前抛弃江州祭酒那样,放弃现在的职务。在地方政府的衙门里太不自由了,充当高官的特使在外面执行任务虽然辛苦,但比较自由,所以可以接受。

桓玄并不满足于只当几个藩镇的盟主,其志在于夺取中央政权。《晋书·桓玄传》载:“玄自为荆、江二州刺史后,屡上表求讨孙恩,诏辄不许。恩逼京师,复上书讨之,会恩已走……”其时桓玄“树用腹心,兵马日盛……自谓三分有二,知势运有归。”又《资治

心,所以当桓玄攻入建康之初,“京师欣然”,开局良好;可惜桓玄同样腐败,举措失当,于是很快就“朝野失望,人不安业”(《晋书·桓玄传》),预示着形势将进一步发生变化。不到一年,桓玄就被北府兵将领刘裕打垮,东晋王朝得以恢复。义熙元年(405)晋安帝复辟,实际掌握国家大权的则是刘裕。

在当时的风云变幻中,陶渊明虽因母丧而完全置身事外,但感情上明显地倾向于桓玄,对于晋安帝司马德宗被软禁于浔阳,他不置一词。

但是陶渊明又是能够与时俱进的,当桓玄失败身死之后,他一度进入镇军将军刘裕的幕府任参军,但为时甚短;稍后又改入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幕府效力,充当他的特使到首都去执行公务。这时他的头衔也是所谓“参军”——一种发生军事行动时临时的差事(《晋书·职官志》载,将军府的属官有长史、司马、功曹

经到了他一生的转折点了。

但他倒也没有在结束此番“使都”之行后立即实行归隐,却又当了一段彭泽县县令。此事出于当时在朝廷上具有高位的叔叔陶夔的安排,陶渊明不便不领他的这份情,当县令也可以进一步为归隐筹集资金(详见《归去来兮辞》小序),所以就照办了;但他的“园田梦”太强烈了,八十几天后终于拂袖而去。

陶渊明最后这三次为官(镇军参军、建威参军、彭泽令)的时间,包括其间的空隙,加起来也不足两年,义熙元(405)年十一月他终于彻底归隐了。

四

先前陶渊明在居丧期间写过一首很值得注意的诗,这就是元兴二年(403)的《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》: